

遏制校园欺凌 需强化规则教育和惩戒功能

俞洲

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多发频发，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5月29日《人民日报》）。

校园欺凌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学生的人身安全，也给校风学风带来极大影响。有人将校园欺凌现象归结于对未成年人的过度保护，呼吁立法机关修改刑法以及相关法律，将这些“小霸王”纳入惩治范围，从根本上惩戒和教育施暴者，为其他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加强法律干预，无疑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也应看到，刑事介入或严法惩处只适用于极端恶性事件，对更多更常见的一般性校园欺凌现象，显然就是大炮打蚊子——使不上劲了。

笔者认为，更有效的方法是，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应从长远发展考量，转变教育理念，高度重视规则教育的实施和惩戒功能的回归。

校园欺凌现象多发频发，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学校教育中规则教育的缺失和惩戒功能的退化，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校园中出现少数具有暴力倾向的问题学生本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因为学校缺失必要的规则教育和惩戒功能，那些本可通过惩戒教育收敛和矫正的恶行，往往会在关爱的名义下被轻易放过，得不到有效抑制。这种变相纵容，不仅使不良少年恶性膨胀、为所欲为，还会使更多学生“抱团成群”。

大多数校园欺凌案例中，受害学生面对不良学生的暴力，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如果不是施害学生为炫耀自己的“威武”，将拍摄视频或图片上传网络，许多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很可能不为人知。为什么众多的受害者在遭遇校园暴力煎熬时，逆来顺受，息事宁人，却很少

主动报告老师，请求救助呢？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因为老师的漠不关心、“不管闲事”，倒不如说是受欺负学生对报告老师能起多大作用心存疑虑，甚至彻底绝望。除了苍白无力的正面教育与爱心感化，失去惩戒权力的教师，面对“问题少年”又能有多大的约束力？“老师也不敢拿我怎么样”，施暴学生自然无所顾忌；而不报告挨打，报告了加倍挨打，失去对教师救助作用的信任后，被欺负的弱者除了沉默又能如何？

在其他一些国家，为更好地引导和教育中小學生，除常规的倡导性要求外，均制定了详实并含有相应后果的行为规范，以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对违反规则要求、触碰规范底线的学生，学校均设定了明确的教育干预措施，经过合理程序后，可实施包括批评警告、逐出课堂、罚写特定作业、勒令停课等处罚。反观我们的教育现实，教育民主和激励教育被哄抬到不正常的高度，教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稍有严厉之举，很可能遭受

非议，被舆论讨伐。违规违纪值得商榷，但如果连面壁思过、责令检讨等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也被归入变相体罚或者心罚的行列，被视为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教师又哪里有足够的权威来培养学生规则意识、教育“问题少年”？如果“把批评视作教师的无能表现”，教师除了“不管闲事”，迁就与奉承学生，还能有多大的作为？

单纯依靠过度的赏识和激励，缺失必要的规则教育和惩戒功能，这样的教育只是一种跛脚教育。有鉴于此，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应借鉴国外一些成熟经验，积极开展中小学生的规则教育，强化必要的惩戒功能。惟其如此，才能使學生增强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有效防范校园欺凌现象。



对实干者“容错”也要对“不作为”者动真格

毛海清

前不久，《人民日报》开辟专栏讨论容错机制建设。其中，某县委书记认为，现在干事创业如同在深水区长跑，如果一脚踏空，呛个半死，再被拉上岸来打几板子，就有点不近情理。而有的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对改革试错强调：“干是必须的，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这些感叹和观点不无道理。

本应该，“不干工作是最大的错误”，但一些庸懒官员的日子一点没有不好过，反倒是那些多干事、真干事的多出错、多受累、多挨板子。两相对照，让人不由得想说一句：相对实干者自然要“容错”，但也要对“不作为”者动真格。

一般来说，干部做事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绩效，这是当前的主流形态。就是说，大多数干部具备基本的履职能力，可以担当改革发展大任。例如，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建德市委书记戴建平，面对旧城改造、征地拆迁、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等难题，带领干部群众打硬仗、勇拼搏，实现改革、发展、稳定全面进步，被称为“敢啃硬骨头的书记”。这说明，只要有正确的理念、科学的态度、扎实的作风，就能够避免失误，办成大事。

第二种是有履职热情，但方法不当，出现较大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比如，4月30日，海口市秀英区琼华村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个别执法人员殴打妇女和孩童，视频流传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区长黄鸿儒引咎辞职，并被免去区委副书记等职务。工作有困难、有风险，首先要肯干、敢干，但也要会干、干好。不然，就该有错必惩。

第三种是“为官不为”。有的干部不想干事或不会干事，碰到困难绕着走，满足于当“太平官”。眼下看风平浪静，其实后患无穷。比如，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项目拖延、服务停滞等庸政懒政局面，让人忧心忡忡。

凡事怕比较，比较知高下。不妨假设一下，黄鸿儒如果与戴建平比，他应该心悦诚服。戴建平干了那么多大事、破解了那么多难题，赢得的是一片赞誉。而秀英区一次拆迁行动就捅出“大篓子”，黄鸿儒作为区长真是应该好好反思。但黄鸿儒若与那些“为官不为”者比，怕是心里会多少有些不平衡。

对创新干事者而言，容错机制可以帮助他们轻装上阵，但对无能不为者，也许没有多大用处——既然无所作为可以安然无恙，又何必自找麻烦去闯去试，出了问题再去申请免责呢？所以，消除“为官不为”的疲态，需要综合施策，容错机制只是其中一招。

一创，容错要与防错相结合，着力提高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尽量减少差错、避免失误，向“第一种形态”看齐。否则，“错不胜错”，就会“容不胜容”。二则，容错要与纠错相结合，纠错是尽责的体现，是容错的前提和保证。事实表明，“有错必纠、有功必奖、有才必用”才是容错的最高境界。若不对“为官不为”现象动真格，既对一心干事者不公平，还会影响更多人干事的积极性。

据6月1日《京华时报》报道：江苏徐州邳州市有家手续不全的污染企业，当地百姓举报8年屹立不倒。最近江苏省“政风热线”节目中，民众当着徐州、邳州两位市长的面愤而投诉，一周后，污染企业12个水泥罐被全部拆除，其他厂房设备也正在拆除中。

据6月1日《新京报》报道：河北井陘县冶里村，视力残障的贾海霞和失臂的贾文其相互扶持，靠植树卖树维生，15年植树上万棵，把昔日荒滩变成了茂密丛林。随着媒体持续报道，两位老人说，成了典型后，树也不敢卖了，“现在就是饿着肚皮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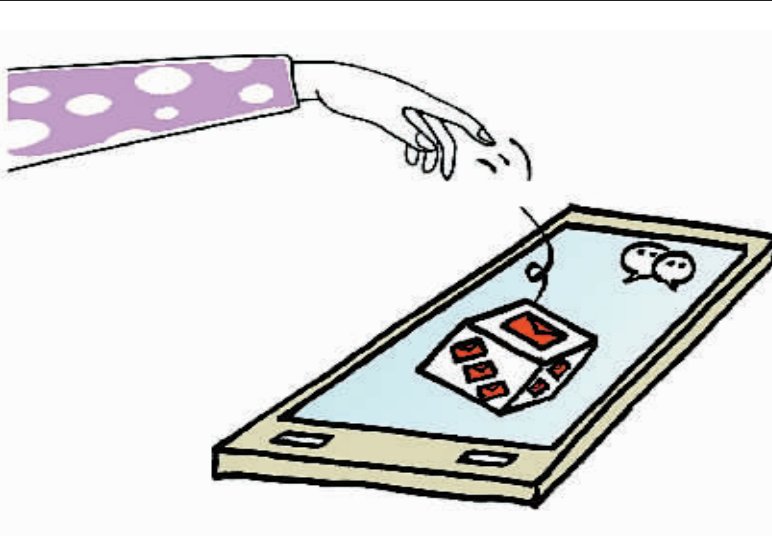
据6月1日《华西都市报》报道：清华大学是不准参观车辆、空驶出租车进入校园的，但在该校西门外，有商贩出租自行车给游客，或用私家车带游客进校园参观。游客只需花费20元，便能在校园里玩一天。

据6月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3年前，武汉徐女士花费12万元为孩子报了17个培优班，5岁的儿子成了幼儿园小朋友眼中了不起的“神童”。然而升入小学后，儿子的成绩不断下滑，开始厌学。徐女士失落又着急：“耗费这么多心血，真的白搭了？”

据6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画里话外

据5月31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毕业季，原本要为找工作而奔忙，湖北武汉一高校大四女生木子，却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只想远离追债者的威胁。原来，一年多前，她在同学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微信红包群，去年一年共发了206万余元微信红包，抢了196万余元红包，输了10万余元。



微信方便朋友交流，使用不当会惹烦恼。游戏当守法律底线，贪欲岂能成为理由。

红包乱象绝非个例，监管缺失难辞其咎。制度建设亟需跟进，多方合力割除毒瘤。

杨继学 文 何青云 绘

“请呵护历史中的人情”打动人心

普沙岭

近期，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因为新的校园规划，要求校内几间提供廉价便利服务的小商铺迁出校园。一些学生认为，此举不仅影响师生的便捷生活，也会对在校已二三十年的摊主生计造成影响，呼吁校方“小心呵护那些漫长历史中生长出的人情与文化”（6月1日澎湃新闻网）。

历史是由细节与人文构建起来的。但在现代生活中，过分强调理性逻辑：“开发”“建设”“发展”“文明化”“都市化”，似乎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通向更好的未来。于是，城中村成了脏乱差的代表，无数小人物的青春奋斗，可以忽略不计；古建筑成了破败的代名词，每一块砖头瓦块上镌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全新的仿造代替；福利社区是计划经济和老企业的产物，邻里坐在一起拉家常的熟悉感，并不被在意……而事实上，人才是现代性的本质，安放人的情感，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学生对于一所学校的留恋，可能是食堂里一道听起来蛮奇葩的饭菜，可能是一个个性十足、

“斗争”过无数次的宿管阿姨……偏偏不见得是校园文化墙上那一年一个台阶的“科研成果”和新大学城那栋栋无比气派的新大楼。如果大学简单地拿起剪刀，将一切关于记忆的“旧东西”粗暴剪掉，显然也剪断了学子与大学最亲近的情感脐带。

时代终究要进步，但进步绝非一次次另起炉灶，将原有的基因与记忆全然抛弃。人情与文化，不是文明的包袱，恰恰是文明传承最好的载体。一些主观性“造城”失败，正是因为丢掉了人情与文化的内核。不管是新农村建设、城中村改造，还是一所大学、一家企业的内部建设，都应该给“敬畏传统”留下一个位置。如果能够站在更高角度，从群体情怀的层面出发，一定可以拿出既能改善环境、又能传承人文的更好“规划”。这从来就不该是一个“有你没我”的选择，而应该是一种“有你有我”的融合。

一个小小的修鞋摊，在校长看来可能确实“可有可无”，“拆了也就拆了”，但它毕竟是“漫长历史中生长出来的东西”，还真不是想有就马上可以有的。希望学子的呼吁，能够唤醒决策者建设家国情的人文情怀和传承历史的使命感。

撕书吼楼，是不是放纵了点？

袁明淙

又是一年高考季，考前减压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考前夕，高三学生流行撕书扬屑、大声吼叫。撕书吼楼俨然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成为考生的狂欢，被称为“高考撕书节”。

“撕书节”的盛行，有深刻的原因：高考指挥棒下，应试教育积弊日深，书山题海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种种禁锢和压力在高考前达到顶峰。高考临近，禁锢被打破，压力需释放，撕书成为宣泄方式。

撕书吼楼现象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多表示理解，认为对考生的青春狂放应持宽容态度。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撕书吼楼中，夹杂了一些其他味道：越来越像一种刻意的集体行为，越轰轰烈烈参与者越觉得过瘾——这样的撕书，有没有一点矫情的嫌疑？部分学生看似自发，其实是被场面和气氛裹挟——这样的撕书，是不是一种“不撕书枉青春”的学步？撕书过程被拍了照片和视频，通过手机和网络流

传——这样的撕书，有没有一点炫耀的成分？

出于对撕书吼楼负面效应的担忧，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反对这种行为。如厦门市教育局日前发文要求，做好高三学生心理疏导工作，认为撕书吼楼等形式背离了学校育人的宗旨，也不是排解高考心理压力的正确方法，应予纠正。笔者深有同感。

且不说撕书有悖于环保理念，也不论吼楼有扰民之嫌，撕书扬屑、大喊大叫，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不文明行为，与书达礼、崇文尊教的传统美德不符，更与当代青年学生应有的阳光自信、踏实负责的精神风貌格格不入。

有竞争就有压力。小学生、初中生的压力也不小，但并没有流行撕书吼楼之风。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学生也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也未有集体撕书吼楼现象。在笔者参加高考的年代，更不知撕书吼楼为何物。可见，撕书吼楼并不是高考减压的必选项。

缓解压力的方法很多，即使在当今这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欠文雅的“撕书吼楼”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时尚，更不应被赋予夸张和放纵的色彩，成为考生的“狂欢节”。

约束力不强，如涉及洋地名，更多是由地方性法规规定，各地态度并不一致，难免互相攀比。程序上，可以参照无锡等地的做法，明确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经过公开听证，涉及文化和历史意义重大或争议较大的地方，应组织权威论证或听证。行政上，则要把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等工作纳入地方领导的考核之中，加强政绩约束和问责。

地名承载着大量历史记忆和民俗风情，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坐标。重要性从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将其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可得到充分印证。因此，不仅要按照地名普查的要求，充分挖掘、系统整理地名文化属性信息，抢救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地名文化，更要从制度上对地名的使用和变更加以规范，免得人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有删节）

来源：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以敬畏文化之心对待地名

自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贡献了一个“香格里拉”后，这些年追求“大、洋、古、怪、重”的乱改地名，早已不胜枚举。究其根源，无非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了文化短视。

地名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地名不可避免地发生变更，但有些原则不能忽视。比如，要注重地名的文化属性，发掘其文化内涵。至少有两种倾向值得重视：一种是忽视原有地名的文化底蕴，改洋地名或靠上名山大川乃至名酒；另一种是过度攀附，就像此前河南鹿邑县想改成“老子县”、贵州水城县想改成“夜郎市”。

还有一条原则是，不能朝令夕改。不难想象，一些地方这次也许会以展现地名文化属性为由掀起复名潮，抑或是攀附历史文化搞伪正名。特别是牵扯范围较广的城市，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的原则，更应慎之又慎。

要么是发展地方经济，要么是展现文化内涵，对那些憋足了劲儿要改名的地方来说，想改总会千方百计地去找理由。所以，不妨借着全国地名普查之机，强化改地名的制度约束。法律上，要加强立法，统一规划。早有分析者指出，尽管国务院于1986年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但从现实来看，涉及地名的命名、更名的操作性和

热点 @微评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6月1日《京华时报》报道：江苏徐州邳州市有家手续不全的污染企业，当地百姓举报8年屹立不倒。最近江苏省“政风热线”节目中，民众当着徐州、邳州两位市长的面愤而投诉，一周后，污染企业12个水泥罐被全部拆除，其他厂房设备也正在拆除中。



据6月1日《新京报》报道：河北井陘县冶里村，视力残障的贾海霞和失臂的贾文其相互扶持，靠植树卖树维生，15年植树上万棵，把昔日荒滩变成了茂密丛林。随着媒体持续报道，两位老人说，成了典型后，树也不敢卖了，“现在就是饿着肚皮喊好”。

据6月1日《华西都市报》报道：清华大学是不准参观车辆、空驶出租车进入校园的，但在该校西门外，有商贩出租自行车给游客，或用私家车带游客进校园参观。游客只需花费20元，便能在校园里玩一天。

据6月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3年前，武汉徐女士花费12万元为孩子报了17个培优班，5岁的儿子成了幼儿园小朋友眼中了不起的“神童”。然而升入小学后，儿子的成绩不断下滑，开始厌学。徐女士失落又着急：“耗费这么多心血，真的白搭了？”

据6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

据6月1日《南方日报》作者：子长